




# 中共党史

口述

实录

中国古籍出版社





第五卷



## 第二章 文革“斗、批、改”时期 历史口述实录

### 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

徐向前<sup>①</sup>

“文化大革命”伊始，急风暴雨，铺天盖地，火药味浓极。《五·一六通知》，批判“彭、罗、陆、杨”，红卫兵破“四旧”，学生“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林彪当“接班人”，全国学生大串联，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半年时间，闹得天下大乱，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与生活。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乱。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文件下达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

11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我说：你们起草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他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会前，萧华同志来我家一趟，送来了讲话稿，我看后略作修改，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11月13日，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不下十万人，又唱歌又呼口号的。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陈毅、叶剑英、贺龙和我讲了话。那时，我们都

<sup>①</sup> 徐向前：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 第五部 狂飙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口述实录

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做出好样子。陈毅同志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还说：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他提醒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贺龙同志也讲了话。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处境岌岌可危，能出席大会，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叶剑英同志也强调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叶帅讲话时，半道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们的讲话，语重心长，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罪状”。

11月29日，军委文革又安排第二次接见。陈毅、叶剑英和我，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踏上主席台，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写着要批判陈、叶13日的讲话，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头痛、疲劳，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陈毅同志讲话较长，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我因头疼加剧，提前退场，未听完陈毅同志的讲话。

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招来了麻烦。觊觎军权的江青一伙，趁势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



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我阅后提了三条:(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刘震、成钧、何廷一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我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能像地方上那样,无法无天,乱揪、乱斗、乱冲。11日,又送来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张涛和谷岩。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说:“这是一个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种对策。

1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 第五部 狂飙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口述实录

一九三八

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名。他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萧华同志。周总理很生气,出来辟谣,说这是谣言。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我们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便未再追究。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我,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他们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我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僵持不下。这时,叶群说她要发言,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批判萧华。她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陈伯达、江青在一边帮腔,说了萧华同志许多坏话。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萧,也都有讲话稿。显而易见,这次“批萧”,是江青、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不少文件。萧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

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在那里火上加油。这时,萧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接下来又发生揪斗杨勇同志的事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尽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1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见,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





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萧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我们批评杨勇，要他检讨，目的是为了帮他“过关”。可是，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1月23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

全军文革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报告他。我上任之初，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请出顾问江青来，陪我去讲话，保干部，不准乱揪乱斗。去了两三次，江青就不干了，她说：“这样下去，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以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你要找她，工作人员不是说她不在，就是说她刚吃完安眠药入睡。全军文革向中央文革请示问题，不论书面的或电话的，犹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林彪更鬼，躲在家里观察动静，极少出面答复问题。叶剑英是军委秘书长，我是全军文革组长，被推在第一线，“坐蜡”的是我们，还有徐立清、李曼村等同志。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略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为了应付这种混乱状况，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多次开会研究，有几次还请陈毅和刘伯承同志参加，大家除了担心、气愤之外，想不出什么扭转局势的良策。那时，离开中央文革和林彪。军委对重大问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即便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决定，又有谁听你的！

连续发生批判萧华、揪斗杨勇的事件后，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1月24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小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约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江青坐在一个角落里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明显流露出她的不满情绪。我想，看来我刚上台，就



要下台啦！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的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你快点走吧！我便起身告辞，将文件送到林办，回家已经是凌晨四时了。“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下午5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

回来我们即以“军委八条命令”正式下达文件。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有了这个“八条命令”作武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腰杆，硬了许多。有些军区，让





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保护起来。对于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三支两军的同志,在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和稳定地方局势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惟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气急败坏,诬蔑军队“镇压群众”,“支持保皇派”,是“带枪的刘邓陶路线”,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妄图煽动群众,与军队对立,搞垮全军文革,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2月8日开始,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时间在下午。会上,以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一方,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为一方,展开了激烈斗争。

那时,地方上的混乱程度比军队更甚。“造反派”全面夺权,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国务院系统受到猛烈冲击,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老同志不约而同,憋着一肚子气,忧党忧国忧民嘛!9日的会上,我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他说刘志坚是“叛徒”,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听了很反感,觉得他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因为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我对他讲了这个情况,说“刘志坚不是叛徒。”陈伯达竟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我气愤地质问他:“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我还针对他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假惺惺地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他:“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11日下午继续开会,叶剑英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军队不能乱,成立战斗组织不好。他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我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会议不欢而散。

16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我没有参加。会后看到简报,知道了会议内容。

那天的会议,本来是准备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正式开会前,谭震林同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谭就冒火啦,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地,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于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



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余秋里同志也拍了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因谢富治一再插话，说什么中央文革经常保谭震林，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辽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同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这次会议，康生、张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份黑材料，向毛主席告我们的状。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开始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16日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后来还说什么，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连续发生激烈争论，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把周总理搞得很被动。

毛主席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表示了态，江青一伙得意忘形。接着即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我们，开了个把星期。康生首先拿我开刀，气势汹汹地说：“军队是你徐向前的？”同时，在社会上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炮轰”、“火烧”、“打倒”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揪陈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显然是指周总理。陈伯达在3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二、三、四月要看出个眉目，但他们把运动打下去了。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干脆取消。

1967年3月24日，萧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听到这一决定，我真是谢天谢地。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我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不干这份差事，正合我意。

卸掉全军文革的包袱，本以为会轻松些，其实不然。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一浪接一浪，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1967年4月上旬,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及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关锋等,均出席会议。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对叶剑英、聂荣臻和我说,由于三支两军是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这次开会,着重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部队的期望。还说: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7日下午突然通知,要我八日在大会上作检查。我说:那也得做点准备嘛,明天不行,推迟两天吧。这时才明白,中央文革和林彪等人,要联合起来整我。11日下午,我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发言,内容无非是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近三个月里,思想上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有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像青海、四川、内蒙、福建、河南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军内共抓了七百多人,取消战斗组织一百多个,打击了“造反派”;积极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帮助不够,有抵触情绪;等等。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在大会上讲话。萧华同志主持会议,也讲了话。陈伯达调门最高,给我扣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搞独立王国”等帽子。谢富治发了脾气,说你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我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样啊!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12日至16日是小组发言,天天出简报,罗织我的“罪状”,无限上纲上线。康生、关锋、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小组里窜来窜去,煽风点火,说我的检讨“没有触及灵魂”,“不像样子”、“极不深刻”。康生说:“徐向前算什么?他代表谁?能代表解放军啊!”还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指1月24日我去林彪家一事)会内会外配合,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陈、徐、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16、17两天,军内“造反派”二百多人,两次抄我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将我保存多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抢去不少。抄家前我在家里,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幸好叶剑英同志关心我的安全,听到点风声,晚上打电话来,要我去西山,这才免遭揪斗。

住在西山,“闭门思过”,心绪不佳。看看书报、文件,散散步,有时和叶帅、聂帅聊聊天。7月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我又变成陈再道、钟汉华的“幕后操纵者”,武汉事件的“黑后台”。其实,天晓得,我住在西山,与外界隔绝,怎么会去制造武汉事件呢?“打倒徐向前”的浪潮,又一次掀起。叶群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他们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揪到北京批斗,追查和我的关系,结果什么也没捞着。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又抄了我的家,抢走五铁柜机密文件。我的秘书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后,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息。





## 第五部 狂飙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口述实录

“八一”建军节在即，“二月逆流”的成员和一些被揪斗的老同志，能否出席“八一”招待会，亮相，成了斗争焦点。周恩来同志用心良苦，坚持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老干部出席，而林彪、江青等则极力反对。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周总理打电话给叶帅，让他转告我，准备出席招待会。剑英同志在电话里对我说：总理说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请示毛主席，待主席决定后正式通知。过了一会儿，剑英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还带了个理发员来，要我一边理发，一边等通知。刚理完发，总理来了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剑英接完电话，高兴地说：为了保证安全，总理亲自布置了你的行车路线，加强了沿线警卫。我出席招待会回来，黄杰同志说，你刚刚走，总理就来电话，问走了没有？他还说：“你和徐帅要多多保重啊！”患难见真情。周总理和剑英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

我虽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工作岗位，但仍是挂名组长，名不符实。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商量，想正式提出辞职的请求，他们完全赞成。那时，“辞职”一事没有先例，我是盘算了很久才下决心的。9月16日，经与叶剑英同志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辞职报告呈送毛主席：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报军委、中央文革：  
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工作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的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而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作过两次检讨，内容不再重复）。本来我已不适于作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工作，但三月底中央决定由萧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常务工作的同时，仍对我保留着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中央对我如此照顾，我内心深感自疚。在萧华的问题揭露后，军委文革小组的工作全部陷于瘫痪。鉴于上述情况，我曾经在军委常委会上口头上提出免除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现在我再一次诚恳地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毛主席十月十二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十月十六日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这样，我只好继续挂名。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的成员，又变成“杨余傅”的“黑后台”，再次遭到猛烈“炮轰”。杨成武是我的邻居，抓他那天，我家的电话线被切断，哨兵给换掉，弄得气氛很紧张。此后，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几个老帅的文件停发，不能过问军委的事情，军队大权被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一手把持。林彪后来敢于利用军队中的少数败类，炮制“五七



一工程纪要”，企图谋害毛主席，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善于奉承、投机的野心家林彪，过分信任，委以重权，结果上了大当。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期间，继续批判“二月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

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九大”作准备的。会议议程是：（一）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二）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讨论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当时，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出席会议的仅59人，不足应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一；而列席会议的却达74人，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准备再花一年的时间，将这场运动搞到底。分组讨论时，就转向批判“二月逆流”和其他老同志。这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预先精心策划的一场斗争。朱德、陈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子恢等同志和我，分别编入各个小组，遭受围攻和批斗。林彪公然宣称：“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我被编入全会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组织指挥。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组，充当急先锋。还有个黄志勇，够卖力气的。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账。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他还不伦不类，抬出江青和我对比，肉麻地吹捧她。黄志勇在延安整风中，就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往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十多天下来，我就像害了场大病似的。

全会通过了将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形成我党历史上的一大冤案。少奇同志因长期受监禁、折磨，不久即含冤去世。他是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白区工作和党的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得以昭雪。他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

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

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1967年“八一”招待会，他同意总理的意见，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席。1968年3月27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里，他没有涉及“二月逆流”问题。闭幕式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他过去不大了解，现在才比较了解，实际上认可了会议的所谓“揭发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一伙疯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图进而剥夺我们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宣告破产。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决不死心。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提出传达时应点“二月逆流”几个人的名。后来的会议简报里，还点了黄杰、张瑞华（聂帅夫人）二同志的名，诬陷她俩是“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黄永胜在总参亲自布置，让下面批判我们几个人，包括黄杰和张瑞华在内。我的办公室党支部正式写了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主席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我进行露骨威胁，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伙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塞进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毛主席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根本不听，千方百计封锁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人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





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11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1500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808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12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 毛泽东一九七〇年的谈话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同我进行的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中,表述了他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些看法。

主席批评了对毛“个人崇拜”的专讲形式的做法,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革命期间曾有必要采取这种讨嫌的做法,并且预言这种做法将逐渐改变。他说,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久将让能代表美国广泛的政界和新闻舆论界的右、中、左三方面的一些人访问中国。他谈到赞成同美国最高级官员(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内)开始进行谈话。他说他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

毛主席强调说,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但是,只是在最近我才能够证实他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早餐，一直谈到一点左右。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正是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我们议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一九六五年一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曾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此外，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我（按：指斯诺）没有受这一套的骗是对的。

我说：“我记得，就在你一九四九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城市或地方。”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有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经卫兵坚持说，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个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说，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

毛主席对这种有关神和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以前的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造一个。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许多人因为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就掉了脑袋。

我说：“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人类已经在一些事情上改变了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五年或者十年以前



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说,没有。说我受人欺骗了。在乡下,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第一个和第二孩子都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一个。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女孩,这位母亲还想再生。很快就生了九个。这位母亲已经四十五岁左右了,她最后只好决定就这样算了。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美国情况也许一样吧?

主席说,要男女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但是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寄很大希望于这两国人民。

如果苏联不行,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两亿多人口。生产已经高于各个国家,教育普及。他将高兴看到在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预料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将高兴同他谈,他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

他说,遗憾的是我代表不了美国;我不是一个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不是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去年了解到。某些中间人当时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旨在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国际保证东南亚的独立;通过弄清台湾问题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七〇年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今年进行的。我自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给戴高乐夫人的对这位决定的唁电,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任何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官很活跃。一位已经访晤过一次尼克松总统的欧洲国家驻北京使团团团长于去年十二月再次来到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跑到白宫去举行会谈,于一月间回到中国。我在二月间离北京前不久,曾自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当时再次转达了一个信息,询问总统如果派一位私人代表前往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在中国首都受到怎样的接待。